

# 香港葡語教學的興衰

Francisco Pelicano Antunes\*

澳門的土生葡語在19世紀（且至少到20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間）仍舊是在香港住的澳門不同移民團體，包括葡僑，華人以及其它民族或種族人士所使用的媒介語言。這是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illiams）所觀察到的情況，他說：“（土生葡語）是葡萄牙語與漢語的混合語。與正宗的葡萄牙語相比，土生葡語的詞彙及發音那麼不標準，不標準到一個剛剛從里斯本來的人都幾乎無法明白是甚麼意思的地步。”<sup>1</sup>

澳門記者馬葵士·佩雷拉（Marques Pereira）曾經於1899年表示，澳門教學長期危機的原因在於本地學校的數量不夠，來自葡萄牙的教師亦不足。此兩個問題造成了澳門土生團體口語及書面葡語水平不高的弊病：

“因此，不久以前，我們難以找到一個不以正確的發音與語法講英語的土生。反過來說，一個能夠用地道葡語進行長時間交流的土生是非常罕見的事情”<sup>2</sup>。

這就是說，根據當時人的記敘，土生葡語就是亞葡血統人士的母語（L1），是他們平時在家庭、家族及學校中使用的語言，而葡萄牙語對那些兒童及青年來說只是他們的第二種語言罷了。<sup>3</sup>

---

\*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高級導師。

1. 衛三畏：“廣東的通俗語言”，《中國文庫》第4期，1836年1月，第428-435頁。
2. 佩雷拉編：《大西洋國：葡萄牙遠東年鑑學報》1863年-1866年，第一組，第1、2冊，教育暨青年局、澳門基金會，1899年/1995年，第55頁。
3. 在這裡，“外語”及“第二語言”的意思相等，遵循（尤其是美國的）英語學者的用法。不過，有的學者認為“外語”的定義應該是一個與母語不同且適用於教學等某一種特定的用途的語言。“第二語言”是任何與母語不同且沒有特定用途的語言。例如戴維·克里斯特爾：《語言學及語音學詞典》，第六版，馬爾登，布萊克威爾出版社，2008年。

澳門商業學校透過其管理委員會秘書阿里比奧·烏巴迪·德·柯維納（Alípio Ubaldy de Oliveira）於1919年簽署的第一個《章程》草案中承認了上述的語言情況。眾所周知，以土生葡語為母語（L1）的人士覺得學習標準葡萄牙語很困難；那麼，為了應對這個問題，《章程》不但禁止使用土生葡語，還建議將葡萄牙語作為外語教給土生葡人。<sup>4</sup>

“在校內嚴禁使用土生葡語。將葡萄牙語設為外語科目；因為學生習慣在家裡用土生葡語與家人交流，所以在習得葡語的過程中他們將遇到與學習法語、英語等一樣的困難。”<sup>5</sup>

1914年，負責為澳門公共教育改革提出建議的專門委員會給政府呈交了一份報告書，其中提到，澳門土生的兒童“在學校時不一定能依賴語言輔導來糾正自己說的，本地葡語方言的錯誤等不良語言傾向”。

因此，葡萄牙語被澳門土生兒童視為一種外語的主張是一點兒都不誇張的態度。<sup>6</sup>

根據阿馬羅所述<sup>7</sup>，至少截至20世紀初，來自葡萄牙王國的人士嘲笑土生葡人的說話方式，也譏諷他們印度馬來式的生活風俗。除了體現葡萄牙人對土生葡語的偏見以外，此現象同時也證明了土生葡語在澳門的活力，其甚至成為澳門葡國人文化的結構性因素。

事實上，澳門土生葡語在19世紀逐步喪失了原有的克里奧爾語的特點，因而且具有接近標準葡萄牙語的趨勢。儘管如此，當時觀察者還是對土生葡語及其本身的複雜社會語言環境做出了負面評價和議

4.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即是說在全部的19世紀及在20世紀的至少首25年間），外語的教學方法與母語的教學方法沒有性質上的區別。二者皆包括講解語法規則、基於無上下文的單詞表而進行逐字翻譯練習等做法；另外，課程也圍繞一些用於練習語法及朗讀的文章。

5. 哥德斯、馬揸度：《兩個土生的機構：澳門土生教育協會及施比祿商業學校：1871-1878-1998》，澳門土生教育協會，1998年，第239頁。

6. 席爾瓦等編：《澳門教育歷史資料》（第一冊），教育暨青年局，1996年，第76頁。

7. 阿馬羅：《從茅屋到水泥塔——澳門是這樣誕生的》，里斯本，社會政治科學高等學院、東方書籍，1998年。

論。借助葡文媒體及葡語教學的影響，土生葡語接近標準葡語的過程在20世紀更加明顯。土生葡語因此進入了“後克里奧爾語的階段”，這是格拉謝德·白妲麗（Graciete Batalha）於1950和1960年代親自經歷的並記載的現象，即她所命名的“當代的話語”。<sup>8</sup>

在與歐洲葡萄牙語加強互動之後，澳門的土生葡語與標準葡語逐漸融為一體了，令土生葡語失去其先有的特徵，可稱是這個語言的一種沒落。若奧·費利西阿諾·馬爾克斯·佩雷拉（Joã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注意到了這個過程：“澳門的土生葡語正在消失，是因為利宵等眾多葡語學校先後在澳門成立的影響。幸虧有他們，澳門的土生葡人對葡萄牙語全面的認識就愈來愈普遍了。”<sup>9</sup>

英屬香港政府於1889年公佈的《教育工作監督報告》很明顯地反映土生葡語所蒙受的在語言、社會、甚至教學法方面的歧視。設於香港的，具有較高教學水平的四所葡語學校均使用澳門土生葡語授課，《報告》批評，“它們推廣一種不嚴謹的語言習慣，以中文慣用的副詞片語替代標準葡語動詞的各種時態及變位。基於這個及其它的做法，土生葡語讓葡萄牙語成為一種中文式的克里奧語”。<sup>10</sup> 此報告的撰寫人認為，土生葡語對教學效果非常無益，隨着小孩兒“升至比較高的年級，礙於他們缺少按照標準葡語文法的規則進行分析的能力”，到時就會遇到大問題。<sup>11</sup> 不僅如此，土生葡語亦讓他們養成錯雜紊亂思維的惡習，最終削弱他們的意志力。故此，要求那些學校採用標準的葡萄牙語成為必然的措施：

“在葡萄牙小孩兒開始學習英語之前，他們必須先學會以自己的母語表達自己的想法。那麼，我十分確信，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應

- 
8. 白妲麗：《澳門土生葡語方言小詞典：附有語言、民族、風俗等筆記》，文化局，1988年，第119頁。
  9. 佩雷拉編：《大西洋國：葡萄牙遠東年鑑學報》1863年-1866年，第一組，第1、2冊，教育暨青年局、澳門基金會，1899年/1995年，第168頁。
  10.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326頁。
  11.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326-327頁。

該先教導他們以符合語法規範的葡萄牙語表達所思所想。這不是說他們一定要學會賈梅士的那種經典的葡萄牙語。”<sup>12</sup>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澳門教學長期處於危機的局面（尤其是典範性教育機構於18世紀後半葉不得不關閉的事情）有利於保存澳門土生葡語。因為這個危機，所以土生葡語的社會語言生態環境得以延續地更久一些。正如佩雷拉所理解的那樣<sup>13</sup>，土生葡語之所以得以延續，主要原因在於學校無法施加壓力推廣官方的標準葡語，“令澳門這個殖民地的公共教育普遍採用標準的葡萄牙語”。

1841年自由港成立以後，香港成為了主要的地域性經濟中心；香港比澳門具有更多的優勢，導致澳門在此後喪失中國與世界唯一商貿平台的地位。香港的繁榮令許多不同國籍的商人離開澳門，選擇在香港追求更好的生機。這些商人主要包括從1654年以來在澳門設有總部的英籍商人<sup>14</sup>，還包括許多年輕土生葡人的記帳員及會計師。<sup>15</sup>他們跟隨其在澳門任職的公司搬遷至香港。

有記錄指出，1846年曾有50名葡萄牙從業人員在香港工作，絕大部份是在商業及銀行業領域，但也有葡僑在英屬香港政府任職。<sup>16</sup>1848年，於香港定居的葡僑總數增至300人；1860年繼續增多，達到了800人。<sup>17</sup>根據官方的預測，1897年有2,263個葡僑在香港生活，其中931個是澳門土生。<sup>18</sup>如安德葛所指，那些葡僑都對加入英國國籍猶豫不決：“葡僑非常緩慢地加入英國國籍。”<sup>19</sup>

12.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327頁。

13. 佩雷拉編：《大西洋國：葡萄牙遠東年鑑學報》1863年-1866年，第一組，第1、2冊，教育暨青年局、澳門基金會，1899年/1995年，第55頁。

14.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大學出版社，1961年/2007年。

15. 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1997年。

16. 蘇志鵬：《自澳門的男孩兒——住港的葡僑》，澳門，東方基金會、文化局，1999年。

17. 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1997年。

18. 其中，1,241個人出生於香港，參見安德葛：《香港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3年。

19. 安德葛：《香港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252頁。

1911年的普查<sup>20</sup>顯示，有2,558個住在香港的葡僑。<sup>21</sup>該城市的外籍人口總共包含5,185個歐洲人及美國人（按照普查的記錄標準，所有美國人均列為“英國人”）及3,482個“印度人與其他國籍人士”。這些數字反映了葡萄牙團體在當時香港的人口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葡萄牙學齡兒童（5至15歲）的百分比是其餘外籍兒童的一倍——包括印度的在內。根據上述的來源顯示，葡萄牙學童總共為約614人。

作為一個已經適應了環境的人群<sup>22</sup>，澳門土生葡人在香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土生葡人不但以商業、銀行及行政職務為主給經濟活動做出貢獻，他們還擔當翻譯員，協助香港的跨語言交流。高馬可和白樂嘉強調：

“因為比起英國人，葡僑更可能與中國人通婚並且說粵語，所以他們似乎排在其他歐洲人與歐亞人之間。”<sup>23</sup>

“他們講一口流利的粵語，而且對他們來說，學習英語口語並不困難。因此，當他們的上司與中國商人交際的時候，他們的語言水平足以擔當翻譯的角色。”<sup>24</sup>

香港的葡僑民眾不符合英國當局的人口分類標準，因而成為一個被隔離的社會團體。他們具有混合的文化認同感。1921年3月的《中國郵報》（China Mail）這樣形容了他們：

“香港的葡僑民眾是一個在熱帶地區定居的歐洲社會，他們已經完全適應了這個環境；在這個群眾裡，表面上沒有一個是從歐洲招聘的人。

20. 科大衛編：《社會：以文獻講香港歷史》，香港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9頁。

21. 考慮到在同一年有3,601個葡萄牙人在澳門生活，可見葡僑從澳門到香港移民的規模非常之龐大。參見古萬年及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1500-2000：人口、社會、經濟因素》，統計暨普查局，1999年。

22. 科大衛編：《社會：以文獻講香港歷史》，香港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0頁。

23.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2頁。

24. 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1997年，第17頁。

他們一方面是本地人，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外地人，因為他們繼續效忠於葡萄牙，並且與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保持聯繫。在這個群體當中，具有比較高的教育水平的少數人士熱衷於精進自己的母語文學語言，不過大多數人更重視英語知識。實際上，在葡僑的孩子就讀的學校裡，沒有對葡語課程的需求。他們底層階級說的是一種葡語與漢語混合的退化語言，沒有任何文學價值。葡僑在早年就開始學習英語，而且他們學得也很快。他們就讀學校的課程對英語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sup>25</sup>

從澳門到香港的移民大浪潮<sup>26</sup>在1840及1850兩個年代中持續發生，其間發生過幾波有規律的移民潮。造成這個現象的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香港為新移民提供的物質利益<sup>27</sup>及澳門經濟急劇的衰落。故此，在香港出現了專門給澳門青年移民的學校。

香港的第一批西式的教育機構是基督新教傳教協會在19世紀第二個25年間成立的，旨在給華人傳教。即是說，那些學校是在自由港成立不久之後出現的。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批教育機構當中，有幾所學校是從澳門遷至香港的，如馬禮遜教育會於1842年<sup>28</sup>在港設立的學校。確實，馬禮遜學堂是香港的第一所歐式的教育機構。

在一名天主教神父的努力下，第一所面向澳門青年的香港學校於1848年成立。在這一所英葡男校中，葡萄牙語教學的重要性是非常有限的。<sup>29</sup>

1850年，有三所面向葡僑的新學校成立（私立學校）。主要着力於英語的教學，只有少數的以葡語授課的課程。<sup>30</sup>

25. 科大衛編：《社會：以文獻講香港歷史》，香港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0頁。

26. 安德葛：《香港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175頁。

27. 白樂嘉：“香港的天主教堂及學校”，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78年/1997年。

28.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

29. 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1997年。

30. 於附錄“19世紀末香港葡萄牙語教學的情況”中，對此提供更詳細的信息。參見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1997年，第19頁。

在那個年代，為了支持澳門土生青年接受教育而成立的大多數學校是天主教傳教會成立的。在金馬倫<sup>31</sup>看來，它們的目的不僅是給青年人提供天主教教育，也是確保青年人有機會接受“英式的”教育。因此，該研究者也認為，這些學校開始為香港的政府部門及公司培養出澳門土生葡人員工，並說這個過程延續到20世紀的第3個25年間。<sup>32</sup>

事實似乎驗證了金馬倫的觀點。下面，我將列舉幾個跡象：

（一）安德葛<sup>33</sup>說一個名字叫J. M. 德 艾爾瑪達（J. M. d'Almada）的具有葡萄牙血統的英屬香港政府秘書長於1854年晉升至殖民地秘書（“colonial secretary”）的職位，雖然他非英籍的身份引起了別人的不滿。在同一年，安德葛還說，在香港保安部隊當中有16名葡僑參加警察志願者。

（二）香港總督1884年在聖若瑟書院發言的時候確認，香港政府部門的大多數員工是葡裔或者華裔。<sup>34</sup>

（三）在20世紀的1920及1930兩個年代裡，英屬香港的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也有幾個葡僑民眾的成員；他們為本地的行政事務提供意見及建議。<sup>35 36</sup>

（四）1940年，兩名葡僑候選人競選市政局成員（Urban Council），並成功成為了那個自治機關的一員。<sup>37</sup>

（五）據高馬可所述，在香港日佔時期（1941至1945年），許多歐亞人及葡僑擔當了日軍政府及華人市民的中介人。<sup>38</sup>

31. 金馬倫：《圖說香港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13頁。

32. 據高馬可所述，英屬香港政府之所以有這麼多葡僑及其它歐洲人士任職的原因是因為，比起華人，他們被視為是更廉潔、更誠信、更有效、更忠於大英帝國的一群。高馬可也強調香港公職中的很多職位是父子傳承的。參見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大學出版社，1961年/2007年。

33. 安德葛：《香港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88及90頁。

34. 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第27-28頁。

35. 安德葛：《香港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294頁。

36.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3頁。

37. 金馬倫：《圖說香港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43頁。

38.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4頁。



（六）在香港1945年被解放後，英屬政府的任重道遠，必須招聘新手。大量的葡僑這個時候在香港的公職裡擔任了責任重大且地位顯赫的職位。這是當時總督所強調的事情。<sup>39</sup>

葡僑主要是在天主教學校<sup>40</sup>——自1882年起<sup>41</sup>，透過所謂的“補助書館計劃”（“Grant-in-aid Scheme”）受英屬香港政府資助——以及19世紀由英國殖民地政府所建成的公立學校中接受教育。葡僑之所以離棄了宗教學校的一部份原因是因為香港開始跟隨英國及全歐洲時代性的教育趨勢，即在優先世俗教育的理念下從教會的手中奪走對公共教育的操控；另一部份原因也是因為香港華人的新興中產階級對英式的教育有了越來越大的需求。<sup>42</sup>

由此以後，雖然私立學校是曾經在香港最先接受葡萄牙學子的，但是它們的重要性逐步遞減。葡萄牙語的教學亦然：雖然葡萄牙語課程列入英屬政府的教學方案內，可是相關的需求一步一步地下滑了。葡萄牙語失去其重要性的同時，也出現了另外兩個現象：一是葡萄牙的學校，作為葡萄牙語的教學機構，在英屬香港公立教育系統裡的地位漸漸下降了；二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葡僑民衆在經濟、政治、社會及語言領域上融入了香港的社會。

本文已經提到的報紙《中國郵報》在1921年這樣報導了葡僑民衆的教育情況：

“他們既是本地人，又持有外國的國籍；他們定居的地方一半兒是在這裡，一半兒是在澳門的。那麼，我們難以確定他們對教育的立場是甚麼。（……）他們對教育需求，是由各種羅馬天主教傳教會來

39. 金馬倫：《圖說香港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69頁。

40. 高馬可這樣解釋這個現象：“許多澳門老家族的葡僑曾經在天主教傳教會的學校接受過教育，然後赴港後在殖民地政府及英國的公司任職，擔當職員或翻譯員。”參見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1頁。

41. 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1997年。

42.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



滿足的。但無論如何，在本港存在着對大量較高學歷的葡萄牙職員的需求，尤其是對高職位的職員。這樣的需求必須要得到滿足。”<sup>43</sup>

特別是從19世紀的最後25年起<sup>44</sup>，學校年度監察報告關於對葡僑職員的需求只有偶爾、零散的記錄而已。那麼，基於學校檢查年度報告的稀少而不完整的信息<sup>45</sup>，在本文附錄中的表2總結了香港的葡萄牙及天主教學校的情況，就是那些一般認為是與葡僑民眾相關聯的學校。監察報告是1870至1894年為英屬香港政府整理製作的，當中涉及的學校僅限於那些受政府監督或資助的學府。

伴隨着英屬香港政府全面融入所有不同群體的教育政策，1890年以後，葡萄牙語的教學開始不受鼓勵。在香港引進牛津及劍橋入學考試以後，葡語教學更加遭拒。<sup>46</sup>幾乎所有的學校，甚至天主教的，都積極加入了牛、劍的考試系統。

那麼，雖然在19世紀的香港曾經有過葡文學校或葡萄牙人就讀的其它學校，但是葡萄牙語作為教學語言逐漸不重要了。連葡式的學校也逐步開始以英語授課，並加入了英屬政府在1882年年底出爐的“補助書館計劃”（“Grant-in-aid Scheme”）這個資助公益教學機構的官方補貼項目。

葡萄牙領導人對於葡萄牙語在港澳的情況毫無疑問是漠不關心的；澳門殖民地政府也好，葡萄牙政府也好，至少直至20世紀的40年代，它們從未給香港的葡語教學提供任何政治機構上的支援。<sup>47</sup>不只是因為這個，香港葡僑群體之所以背棄了葡萄牙語也是因為他們主動融入了香港的社會。雖然社會融入不是葡語滅亡的重要原因，但是香港的葡僑最後決定習得英文，自然而然成為本地社會的一份子。為了

43. 科大衛編：《社會：以文獻講香港歷史》，香港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2頁。

44.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

45. 值得強調的是，“稀少而不完整”只形容與葡僑教學情況有關的信息，因為這些信息在教學年度監察報告中的確是很罕見的。

46. 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1997年。

47. 白姐麗：“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世界的葡萄牙語教學現狀——研討會紀錄》（第一冊），里斯本，葡萄牙語言及文化學院，1985年。

重整本地的公共教學制度，澳葡政府於1914年7月30日發表了一份工作報告，其中指出：

“我們葡萄牙人很痛苦地見到澳門土生葡人的家長以英語歡迎其從上海或香港來訪的子女，這是因為比起土生葡語，英語對他們來說更便於表達自己。

如果還有人記得，許多（澳門的）小孩兒在接受基礎教育以後就輟學，那我們大概能想到他們的葡萄牙語語言知識是多麼薄弱。而且，當他們移民至上海、香港等城市以後，連這些知識他們都會非常容易忘掉。”<sup>48</sup>

對於這個情況，白樂嘉說：

“到香港的澳門移民先驅者還能夠很好地掌握葡萄牙語；不過，兩代以後（……）遺憾的是，香港的葡僑缺乏葡語知識。也就是說，香港葡僑群體對習得紮實的葡語知識毫無興趣也是不足為奇的。”<sup>49</sup>

英屬香港政府1888年的學校年度監察報告的分析卻與上述的結論不一致；監察報告中批評211名葡萄牙學子就讀的三所葡萄牙學校用澳門土生葡語授課，而不是標準的葡萄牙語，報告指出：“（學子）僅使用葡萄牙語的澳門方言接受教育。”<sup>50</sup>對報告撰寫人而言，澳門土生葡語是“（……）一個不嚴謹的通俗語言，動詞變位及句法都殘缺”<sup>51</sup>。

那麼，鑑於當時的記載，可以合理地推測香港天主教學校授課的葡萄牙語對絕大部份葡萄牙學子來看是一門外語。

- 
48. 席爾瓦等編：《澳門教育歷史資料》（第一冊），教育暨青年局，1996年，第76頁。
49. 白樂嘉：“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史，若干筆記”，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69年/1997年，第30頁。
50. 在同一份文件的第9項裡，報告撰寫人更進一步解釋，在“以葡萄牙語的本地方言”接受歐式教育的過程中，葡僑學子既不學中文，又不學英文。參見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313頁。
51.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327頁。

透過1931年8月1日頒佈的第196/31法令，澳葡政府給本地及香港的學校提供資助，旨在鼓勵它們繼續提供葡語課程。<sup>52</sup> 澳葡政府採取這個措施的時候，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早就陷入了不可逆轉的危機，而且葡僑群體已經完全融入了本地的生活，乃至遠離了其祖國的文化及傳統。<sup>53</sup> 他們並不覺得課程中需要加入葡語科目。<sup>54</sup>

## 附錄一 19世紀末香港葡語教學的情況

1870年，中央書院曾有2名葡僑學生就讀。在其他的學生中，混血兒的數量有了相當可觀地增長；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其中至少一部份是亞葡人士。<sup>55</sup>

在於1881年受香港政府資助的學校當中，有3所是以葡語為授課語言的，且它們均屬於天主教會。其餘的學校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它們一律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sup>56</sup> 在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天主教學校裡有由“基督教兄弟會”（Christian Brothers）管理的聖若瑟書院；這是一所主要面向商業教學學校，且其大多數學生為葡萄牙兒童（男童）。<sup>57</sup> 書院分為華人學生部和葡萄牙學生部兩個不同的校部。<sup>58</sup>

1881年，維多利亞的一所男校和一所女校均由羅馬天主教傳教會監管；不過，課程中不設宗教科目。這所男校與聖若瑟書院不同，在

52. 文德泉《澳門的教育》，澳門，教育暨青年局，1982年。

53. 白樂嘉：“香港的天主教教堂及學校”，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78年/1997年。

54. 早在1883年，即半世紀以前，卡西恩（Cassian）神父指出：“因為英語教學的大力推進，所以家長及學子對葡萄牙語的興趣逐年遞減。引自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527頁。

55.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138頁。

56.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30頁。

57. 白樂嘉：“香港的天主教教堂及學校”，席爾瓦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教育暨青年局，1978年/1997年，第71頁。

58.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31頁。

那裡有華人與葡萄牙學生的混合班；在聖若瑟書院裡，華人與葡萄牙學生卻以分開的班組上課。<sup>59</sup>

其他於1881年受政府資助且採用歐式教育的天主教學校都是以葡語授課的，如聖弗朗西斯葡文學校（幼教）和必街貧民學校（一所男校和一所女校）。它們是在意大利慈善修女會的指導下而建立的葡英學校。兩所必街貧民學校都收容貧困的葡萄牙兒童。<sup>60</sup>

1882年在香港有2所天主教學校（報告製作人並沒有提及名字）使用葡萄牙語作為授課語言。然而，作為一個“管理優良”的，同時教育葡萄牙及華人學生的學校，聖若瑟書院卻只用英語作為其唯一的教學語言。<sup>61</sup>

中央男子書院有不同國籍的學子，也包括葡萄牙的學生。

聖若瑟書院被1882年的報告視為最重要的香港葡僑的教學機構。雖然書院的教學語言為英語，但大部份男學生（男童）只會說葡萄牙語。<sup>62</sup>

1883年，有3所學校為總共197名學生以葡語提供歐式的教育。<sup>63</sup>

據學校監察報告記載，在1884年有822名學童以英語或葡語接受歐式的教育。受政府監督的學校使用英、葡、中三種授課語言；而且，在中英學校的課程中包括葡萄牙語科目。<sup>64</sup>

59.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31頁。

60.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32及281頁。

61.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39頁。

62.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40頁。

63.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54頁。

64.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64頁。

1885年，有記錄顯示3所面向葡僑學生的天主教學校用葡語為授課語言；另外2所接受葡僑的女學生，但是以英語授課的。<sup>65</sup>

1885年的報告中附表一張（見表1），記錄了聖若瑟書院葡僑男學生從1881至1885年間的出勤及考試情況：

**表1 聖若瑟書院葡僑男學生從1881至1885年間的出勤及考試人數<sup>66</sup>**

聖若瑟書院 歐洲部

| 年份   | 出勤學生<br>(人數) | 參加考試的學生<br>(人數) | 參加考試/出勤學生的百分比 |
|------|--------------|-----------------|---------------|
| 1881 | 240          | 111             | 46.25         |
| 1882 | 256          | 105             | 41.01         |
| 1883 | 240          | 149             | 62.08         |
| 1884 | 219          | 141             | 64.38         |
| 1885 | 186          | 123             | 66.12         |

來源：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81頁。

**表2 1870至1894年間香港的天主教及葡僑學校統計  
(據政府教育報告的數據)**

| 年份   | 學校      | 教學語言 | 葡萄牙學生人數 |
|------|---------|------|---------|
| 1870 | 3所天主教學校 | 葡文   |         |
| 1881 | 3所天主教學校 | 葡文   |         |
|      | 2所天主教學校 | 英文   |         |
|      | 1所天主教學校 | 英文   | 240     |

65. 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第274頁。

66. “補助書館計劃”（“Grant-in-aid Scheme”）的審批標準參考在每所學校通過考試的學生人數。

| 年份   | 學校      | 教學語言    | 葡萄牙學生人數 |
|------|---------|---------|---------|
| 1882 | 2所天主教學校 | 英文      |         |
|      | 1所天主教學校 | 英文      | 256     |
| 1883 | 1所葡文學校  | 葡文      | 197     |
|      | 1所天主教學校 | 英文      | 240     |
| 1884 | 1所天主教學校 | 英文      | 219     |
| 1885 | 3所天主教學校 | 葡文      |         |
|      | 2所天主教學校 | 英文      | 葡萄牙女學童  |
|      | 1所天主教學校 | 英文      | 186     |
| 1888 | 3所葡文學校  | 澳門克里奧爾語 | 211     |
| 1889 | 4所葡文學校  | 葡文      | 236     |
| 1890 | 4所葡文學校  | 葡文      | 280     |
| 1891 | 4所葡文學校  | 葡文      | 184     |
| 1894 | 3所葡文學校  |         |         |

來源：白潔蓮：《1848-1896香港教育發展史（1841至1897）——基於英屬香港政府的早期教育工作報告》，香港，文韻出版社，2002年。